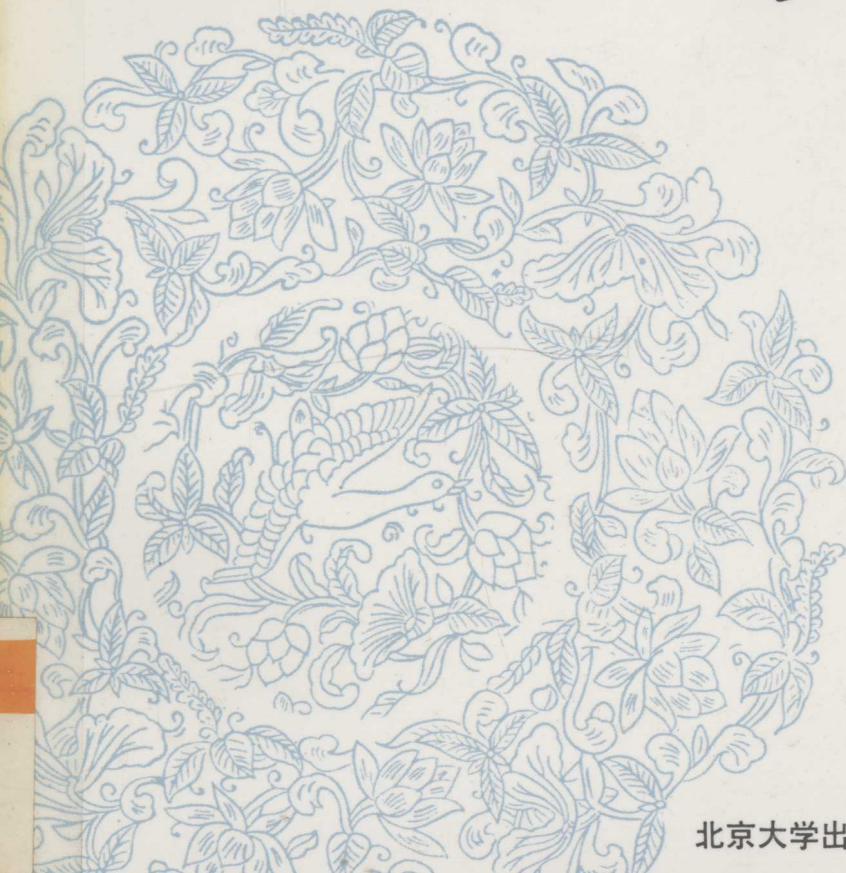


季镇淮 著

来之文录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丛刊之三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丛刊之三

来之文录

季镇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书 名: 来之文录

著作责任者: 季镇淮 著

责任编辑: 张凤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1791-X/I·272

出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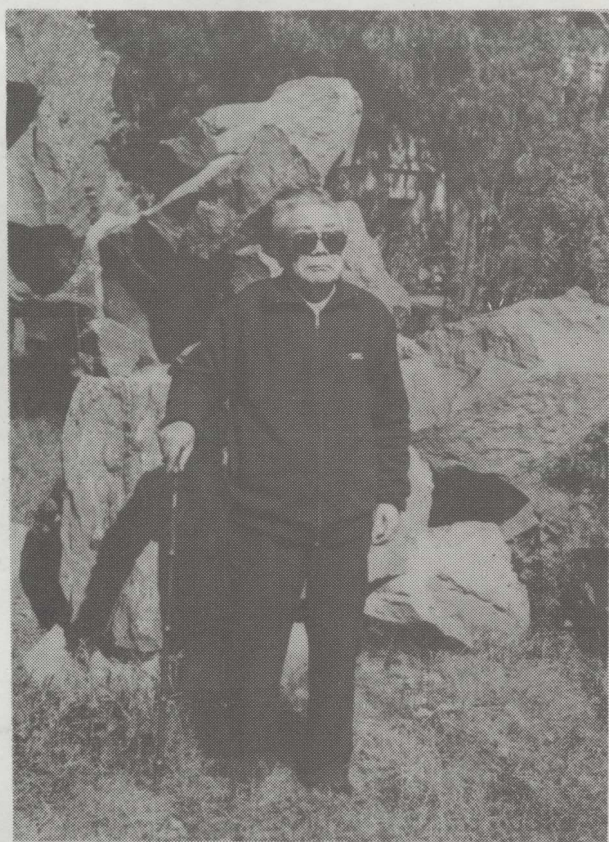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125 印张 390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

定 价: 25.60 元



大学时代



季镇淮先生近影

序

第一次知道季师镇淮先生的名字，是从家中书柜里那套蓝皮《中国文学史》的封面上。它昭示着我所不懂的深邃学问，未读其书，我已对这位主编者之一生出敬意。

似乎是一种特殊的缘份，1978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不久，我便有机会亲聆先生的教诲。这原是沾了晚入学的光。我们十名扩大招生后录取的学生，比之先在校的同学，已脱了一个月的课。其它课程还好办，借读笔记即可赶上，而对于重头课中国文学史，却不能马上进入规定情境。补课的问题于是提出。出乎意料，前来为我们十人“开小灶”的竟是季先生。这样，我们反而比其它同学更早认识了这位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季先生头发花白，身材宽厚，穿着一套当时常见的灰色制服，与我想象中的“恂恂儒者”没有大出入。他讲课并不完全依据文学史教材，常以自己的研究所得作补充、发挥。即以“古代神话”而言，他在讲授中，便将其内容区分、概括为“关于自然现象的解释”、“关于人与自然的斗争”、“关于生产劳动中的发明创造”以及“关于种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四类，比较文学史所述更简明、清晰，便于初学者掌握。而这些意见，又构成收入文集的《古代神话述略》一文的基础。这使我感觉到，季先生对自己参与编定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始终抱着并不满足的态度，不断地思考与探索着，力求有所改进与提高。

再次上季先生的课，已是临近本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先生开设了“韩愈研究”专题课。其时我于唐代诗歌颇有兴趣，加之对老教授的课抱着“有讲必听”的原则，便毫不犹豫地报名选修了。季先生

对韩愈研究有年，识见成熟，所用已呈黄色的讲稿，便是五六十年代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撰写《韩愈》一书的成稿。只因文革猝起，时光迁移，他对韩愈的论述还没有机会广为人知。季师以韩愈作为唐代文学的研究重心，也许是受到闻一多先生的影响。闻先生在1936年清华学生举行的鲁迅追悼会发言中，曾以韩愈比鲁迅，谓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中，支配我们最久最深刻，取着一种战斗反抗的态度，使我们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是谁呢？是韩愈”。他认为韩愈与鲁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们不动人作好事，而是骂人叫人家不敢作坏事”（见季师《闻一多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而据我这个无知后辈的妄测，季先生的为人忠厚，本与研究对象个性相左。若“尚友古人”，似不应亲近韩愈。他之选择韩愈，恐怕除了出于对导师的尊敬，也还包含着一种学术追求。实际上，先生确能切实体会并由衷赞赏韩愈狂傲个性中的真率之气。印象最深的一例是讨论韩愈的三封《上宰相书》，一再向君、相要官做，季先生以为其文理直气壮。后人对韩愈此举多嗤之以鼻，鄙薄的原因或因其失读书人体面，过于直露，或视为官迷心窍，一心一意向上爬。而照季先生看来，这里并没有人格问题，韩愈只不过大胆表露了本阶级的真实思想。因为在他的想法中，士、农、工、商，各有一行，“士”从古以来就是以作官为职业的，“学而优则仕”对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本是天经地义。这样解说，便是在学术的层面上讨论问题，避免了屡见不鲜以致习以为常的简单化、庸俗化弊病，使结论合情合理。季先生本人不长于行政，系主任解任后，他曾表示有一种轻松感。他对韩愈的诤论，并非出自个人好恶，做到了客观、公正，于此也可见出其天性中宽和恕人的一面。

课程结束，我虽大致通读了一遍《韩昌黎集》，读书报告却取巧，只将韩愈的《南山诗》与王维的《终南山》对比，颇不以韩诗的铺

陈为然,实仍以盛唐诗风格苛求中唐以后诗。季先生阅后不以为忤,反欣然加评曰:“今之青年耐读《南山诗》者不多见,故以优异视之。惟与王维《终南山》比较研究的结论,则似有问题,尚待进一步讨论。”或许正是由读《南山诗》引起的这点好感,后来我才得有登堂问学、亲承耳提面命的机缘。

考上研究生,以中国近代文学为专攻方向,我也从一个一般的受业学生成为季先生的及门弟子。对于近代,除了文学史最后两次课上开列的一大篇生疏的作家作品名单以及教材上简要的介绍,我可以说是茫然无知。如何学起,也觉得没有头绪。季先生却不急于把我的读书计划导向近代,反而要求我从清代文学入手,尽可能多读重要作家的专集。我虽因疏懒及时间所限,两个多学期只读了清初至乾隆时期若干文人学者的诗文集,已感到受益良多。近代文学不再是一座无法攀援的飞来峰,而是自然化生而成,且有径可循。季先生对我读书的指导中,贯注着鲜明的文学史意识,这恰是季师始终自觉追求,并努力实践的一种研究古典文学的基本态度。

读研究生期间,还第三次坐在课堂上听了季先生的课。这回因为带着我这名学生,课目便是讲“近代文学”,而以龚自珍的研究为主。虽然因为近代属冷门,选课者不过三四人,季先生却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内中对龚自珍《尊隐》一文的解说,即是凿凿有据的独到新见。季师不同意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指龚氏所尊之“隐”为“山中之民”的说法,以为文章只读懂了一半。而将龚自珍各篇论述中体现的思想融贯之后,他指出,《尊隐》后半篇言及的“纵之隐”即如老子之隐于柱下一般不着实迹的历史家,才是作者真正所尊之“隐”。由此断定龚自珍的思想高度只在于能够认识历史的变化,自己却不参与其事,他肯定变,但不知如何变。这一论断较之以所尊之“隐”“山中之民”为反抗清王朝的政治力量,从而易于拔高龚自珍的思想,无疑更切合实际。

三次听讲，所习正是季先生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三个重心：先秦两汉、中唐及近代。每一时期又各有侧重点，分别为司马迁、韩愈与龚自珍。季先生选取每段文学史中具有开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家，作精湛的个案分析，便可以顺流直下，理清纷繁的历史发展线索。这一研究路数，以点带面，诚为研究文学史的有效方法。

仅从听讲所得，我已知季先生手中积有不少成型的书稿，都具备相当高的学术水准。1983年齐鲁书社的一位编辑通过我向季师约稿时，我满以为一说即成。不料，季先生却婉谢了出版社的好意，以为自己的稿子还不成熟，尚须推敲。他以杜甫作诗“毫发无遗憾”的警言自求，虽年迈体衰，而其志不改，这令我十分感动。前两年，季师有意修改《韩愈》一稿，请人誉清后，又感觉以今日的眼光，作家研究领域应有拓展，从而决定把韩愈放在唐代文化的背景中来论述。这需要阅读大量的原始材料。季先生并不知难而退，反从《全唐文》读起，从头开始。因此，季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界尽管享有大名，至今出版的专著却只有《司马迁》与《闻朱年谱》。而前书在两汉文学研究者中，恰是众口称誉的精品。不过，其后看到诸家有关韩愈、龚自珍的论著不断问世，私心总为季先生抱憾。

这次选编论文集，也是经我们学生辈及出版社的一再催请，才得以完成。这部文集尚不能囊括季先生学术成果的全部精华，已以其厚重的份量，显示了坚实的功底。季先生在《后记》中自言，其文无论长短，“都是用力作的”，每成一文，“是一次战斗的结果”。确系写实语。即以殿尾的一篇《略谈怎样读〈诗经〉》为例，文不足四千字，却旁征博引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朱自清的《经典常谈》、闻一多的《楚辞校补》、《诗经通义》、《说鱼》、《给饶孟侃先生》诸作，以及《孟子》、《诗·小序》、《儒林外史》，提到的书则更多。可知季先生对著述看得很重，必研究有得，思虑成熟，方才命笔。

此集所录文章分为六辑：第一辑多为1949年以前所写，涉及的时代上起殷商，下至唐朝，而以汉末、魏晋间为大宗。其中不少文章都经过朱自清先生审阅，予以好评。多篇初刊于朱先生主编的《新生报·语言与文学》专栏的文章不必说，即如《“文”义探原》一文，初稿名《释文》，二万多字，也是经朱先生阅后，推荐到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讯月报》发表的，因金甲文排印上的困难，而压缩至一万五千字。该文对“文”字意义变迁的历史考察，令人信服。值得一提的还有《魏讽传》，学友王瑶先生曾对此文极为赞赏。传文模仿《三国志》文笔，老到精炼，于不动声色中寓深刻讥讽，颇耐回味，学《春秋》笔法很到家。第二辑至第四辑，依次收录了先秦两汉、韩愈、近代的有关论文，为季先生1949年以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作。第五辑专收纪念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导师的文章，于其治学途径与学术精神尤所重视。末辑为谈文学史研究的散论，各文篇幅不长，泛而不空，均为有的放矢之作。

通读全书，可以感觉到季先生前、后期学术风格的变化。第一辑文章作于年轻气盛的二三十岁，头脑敏锐，思想活跃，不乏少年意气，也常有精彩议论。采用传统考据学方法固是得心应手，却也不放弃别种研究路数。《〈老子〉文法初探》一文，即是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左传〉真伪考》影响，借用其语言比较分析法，考证《老子》这部古书，得出了“《老子》和《论语》《孟子》是一个文法系统”、“《老子》书应成于战国晚年的齐鲁人之手”这样与古代成说截然不同的结论。当时，语言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学术界还相当新鲜，难怪罗常培先生对青年学子能写出此文颇感惊讶。这一时期，季先生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文风相当泼辣。为《魏晋清谈思想初论》所作书评，即是显例。1947年，朱自清先生曾布置其三位研究生各写一篇书评，三人均选择了当时新出版的名人学术著作：由王瑶评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范宁评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

注》，季先生瞄准的便是贺昌群的这部扛鼎之作。贺先生学问很好，此书又是积年而成，评论的难度相当大。季先生却凭着他对史料的熟悉与不迷信权威的锐气，在多篇研讨汉末及魏晋人物的文章基础上，充满自信地向贺书发难。他紧紧抓住贺昌群对《晋书·阮瞻传》“将无同”一语的误读，把“将无”这一表示反问的语气词割裂开来，又就其中的“无”字发挥开去，以道家的“无”等同于儒家的“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而引证王若虚《滹南集·谬误杀辨》中语，作了有力的论析。他对郭象《庄子注》中所含向秀思想的精微考辨（《竹林故事的结局》中曾有论述），也使他有理有批批评贺书“没有把思想的发生和现实环境密切关联起来”，在解释上出现偏差。即使有心“立异”，季先生也绝不大言欺世，而是经博考详察之后，一语中的，从重要观念、材料的辨析入手，颠覆并重建整个结构。拜读这一组文章后，不免遐想，季先生倘若继续于两汉、魏晋间用力，必已卓然成家。

随着教学任务与职责的确定，季先生后期学术研究也转变了方向。文章已是老成持重，功力日益深厚，断论每称允当。第二辑之《司马迁评传》、第三辑之《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都是不可多得的力作。季先生尽管几乎遍阅司马迁及其《史记》与相关时代的材料，写作中却能化繁为简，融会贯通，引文少而精，又语语有据，庶不致以填砌满目的引证窒息了文章流动的生气。这种写法看似轻松，实更艰难，它为撰写古代人物传记中材料的处理提供了启示。而韩愈作为唐代儒学复古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其思想究竟如何把握，历来众说纷纭。季先生扣紧韩愈对于“道”与“道统”的认识，揭示了其思想中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努力维护‘道统’，一方面又在这种努力之中起着破坏‘道统’、即从‘道统’中解放出来的作用”，便使问题明朗化，为解释韩愈的思想矛盾提出了正确的思路。或许与稳健的批评不太和谐的，是《〈近代诗选〉前言》一文。以“政

治标准第一”作为近代诗选与诗评的标准,不免过于狭窄。而人们对近代比对古代评价态度更严厉,则是由于近代距离较近,为了肯定“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方向,因而贬抑过渡时代文学的贡献,以致轩轻失当。不过,《近代诗选》的出版,毕竟在近代文学研究中有筚路蓝缕之功。季先生作为率先倡导者,也以他持之以恒的努力与热心,在这一领域赢得了崇高的尊敬与威望。

而统贯其所有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便是强烈的现实感与自觉的文学史意识。

古代文化的研究最易走入“为古而古”之路,使学术与现实了不相关。季先生却不然。自研习古典文学之初,他就以“有为而作”自期。第一辑中的文章即不时闪现出批判现实的锐利锋芒。如《汉末的人物批评》对“举贤才”的评论:“那至高无上至大无外受命于天的圣王是统一的大家庭的家长,天下万民在奴婢的基础上自由平等。因此,汉代的百官选举,在本质上不过是从奴婢的队伍里挑选能干的老实的大小管事罢了。”文中对于激动风气的“清议”者流的遭遇是这样叙述的:“那对手一边,早已知这风声不好,加紧戒备,而且加以还击,可不是言辞闹着玩的了,而是明正典刑,暗杀恐怖,以及一切可能残酷的手段。于是清流在‘钩党’的罪名下,死的死,逃的逃,禁锢的禁锢,成百上千的一批一批的献身于清议,大小悲剧不知演了多少幕,先后经过了几十年。这一段惨痛的历史,虽远在一千几百年前,但我们依然觉得如同昨日一样的亲切!”这些话讲的是古代的人与事,我们却分明从中感受到现实的气息。古为今用,借古讽今诚然可能导致歪曲历史影象,这类的教训已足够多,然而谨慎的使用,把握好分寸,使理合于事、情切乎实,也未尝不可以沟通古事今情,令人发出会心的一笑。文集中说隐士二文,便有这样的妙处。对于孔子思想与生活的矛盾,季先生作了如下分析:“他代表贵族政府发言,但他也为平民讲话;他不能投身昏聩的

贵族政府，但他也不甘沉沦而为平民：他终于是一个旁观的建议人。最后，他寂寞地退守着讲坛，发表了他的两面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样，他实际上已向他理想中的那整体的命定的社会宣布分离了。”而儒、道两家在隐士意识上的汇合，在季先生看来，正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点”（《儒道与隐士》）。这样的剖析，让我们联想到现代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政所扮演的悲剧角色。而隐士们从春秋战国时的背时倒运到汉代以后的大走鸿运，是这一阶层日益世俗化的结果。隐士之为“离众独行，取异于人”的愤世嫉俗者，到了汉代的“商山四皓”，已开始透出帮闲政客的臭味来，因此成为皇家的上宾。对历代文人津津乐道的严子陵加足于汉光武帝之腹的故事，季先生如是说：“隐士们都想要压着皇帝的大腿的！不过这也无关大体，光武仍得自称曰‘朕’，子陵仍然称他‘陛下’，主客身份，总算表示得清楚”（《隐士的时命》）。这类察其深心的议论，有现实的感慨，也不离乎史实，最为得体。自然，感时色彩最明显的，是有关嵇康被杀与竹林名士的一组文章。文成于闻一多先生遇难后，季先生借助论史文字，寄托了他对闻先生被害的愤慨之情。其中《竹林故事的结局》，对向秀违心的“劣许优尧”论以及他写作《思旧赋》情景的描述，颇具小说意味，却极为真实可信，令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命运生出同情。并不是说集中所有的现实感慨都可取，《〈近代诗选〉前言》便有如前所述因贴近现实需要而出现的偏颇。同样不言而喻，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还应建基于尊重史料的客观性之上。

这便关联着季先生治学的另一品格。无论研究对象为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他总是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把握，前后左右的思想文化背景均收入视阈，而从不孤立地谈论其价值。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在司马迁与《史记》的评价中充分显现出来。季先生反对以文学作品视《史记》传记文，以为此说明褒实贬，理由是：“司

马迁首先是一个历史家，而一切文学家，归根到底，也就是历史家，“只要它是文学作品，就是历史，是种特殊形式的历史”；文学家与历史家的不同，只在于创作方法的区别（《司马迁的传记文》）。本着这样一种文学的历史观，季先生对作家作品所产生时代的政治、经济及其它意识形态的状况便予以突出重视，甚至说：“只要这些历史背景弄清楚了，文学的现象和问题就容易了解了。至于一篇作品的艺术欣赏，也不可能离开历史内容而得到抽象的美的享受。文艺赏析如果只在语言形式以及风格流派上琢磨，而忘记或不甚重视联系历史内容，那是未尽全功，意义不大的”（《略谈文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季先生本人的文章显得厚重，原因即在于此。他对韩愈思想的研究，也是很好的范例。他把韩愈放在唐代藩镇割据危及中央政权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因而指出韩愈的“道统”观念及以其为首的复古主义运动，“在贞元时代，它既是唐德宗力求恢复和稳定王朝统治的有效的思想宣传，而在元和时代，它就成为唐宪宗决心削平藩镇的思想基础”。至于韩愈思想中的矛盾，则又是统一王朝受到各种社会力量挑战无可排解的现实反映（《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季先生所取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当然得自马克思学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也与中国历史上“六经皆史”的命题相关，二者在对历史的关注上可以契合。经由龚自珍对后者的体认，这一经学史学派对季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史的研究确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不过，对此也不宜作狭隘的理解，否则便会导致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模糊了文学区别于史学的特点。何况，形式与意义也不能截然分开，这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尤其明显。

在1948年写成的《书外杂谈（一）》中，季先生对读书与研究的态度作过一个历史的概述：从古代以“尊经”为中心的“信古”，到晚清以来渐起至胡适、顾颉刚而大成的“疑古”，再演进为冯友兰所代

表的“释古”，最后出现郭沫若的“批判”即“议古”。四种态度中，季先生对“议古”最赞许，以之为学术研究的最高阶段。从他引用朱自清先生的话对“议古”所作的阐释，“不‘只以解释为满足’，而要进一步‘去批判对人民的价值’”，以便决定接受或扬弃，便可以知道，历史观念与现实意识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原是密不可分。

《来之文录》编定，季先生嘱我作序，虽不胜惶恐，却是“恭敬不如从命”。因叙从师经过及季师之学术成就与研究途径如上。后生出言无状之处，尚祈先生海涵。

夏晓虹

1991年5月15日于畅春园

目 录

序.....	夏晓虹(1)
--------	--------

第 一 辑

《老子》文法初探.....	(3)
“夏声”一解.....	(12)
“文”义探原.....	(19)
儒道与隐士.....	(37)
隐士的时命.....	(42)
经今古文之争与贾逵.....	(51)
汉末的人物批评.....	(56)
魏讽传.....	(59)
司马昭杀嵇康的年代.....	(63)
嵇康之死辨闻.....	(66)
竹林名士可能结游的时代.....	(71)
竹林故事的结局.....	(77)
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84)
陈子昂断想.....	(90)
书外杂谈(一).....	(95)
教书杂记.....	(100)
谈“无巧不成书”.....	(107)

第 二 辑

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文学叙说·····	(117)
古代神话述略·····	(124)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	(139)
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的	
——从“实录”到典型化·····	(148)
司马迁的传记文·····	(159)
司马迁传记文释例·····	(176)
司马迁评传·····	(183)
司马相如考述	
——关于司马相如的生平和创作·····	(219)

第 三 辑

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	(231)
韩愈的“古文”理论和实践·····	(248)
韩愈的古文·····	(264)
唐贞元、元和时期的古文运动和韩愈的古文	
——童第德《韩愈文选》后序·····	(279)
韩愈的诗论和诗作·····	(292)

第 四 辑

《近代诗选》前言·····	(317)
龚自珍简论·····	(345)
康有为评传·····	(358)
梁启超简论·····	(371)